

浅析义成公主在突厥与唐初诸势力关系中的作用

邓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院 830054

摘要：本文时间主要限定在武德二年闰二月至武德三年十一月；即处罗可汗侯利弗在位时期，地点主要在今山西，陕西，内蒙古，本文认为处罗可汗在位时期对待李渊是消极进攻，并不是以复隋为目的；义城公主出嫁突厥，历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位可汗，在启民，始毕，颉利时代在助隋、复隋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在处罗可汗时代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和义城公主在处罗可汗时期的影响力下降有直接关系也和处罗可汗的错误战略有关系。

关键词：突厥；李渊；王世充；复隋；梁师都；义成公主

隋末群雄并起，及隋炀帝江都兵变被杀，各方势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强大起来的有河北的窦建德，关中的李渊，洛阳的王世充，马邑的刘武周，内蒙古的梁师都；《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云：“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其中尤以王世充和李渊实力最强，而都臣属于突厥。

谈论隋末的突厥不得不从始毕可汗说起，而关于始毕可汗死亡的月份史料有所出入；有武德元年、武德二年二月、武德二年四月、武德二年春、武德二年闰二月这几种说法；而始毕可汗去世的月份恰好就是处罗可汗继位的月份。

《旧唐书》卷五十七云：“武德元年，勅右武侯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路经丰州口可汗死，勅于所到处纳库，突厥闻而大怒欲南渡，长逊乃遣高静出塞，申国家赠礼之礼，突厥乃引还。”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称：“二年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谋入抄掠，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以北，立其弟侯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唐会要》卷九十三称：“二年二月，始毕死其弟处罗可汗立。”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十四称：“二年春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谋入掠抄，四月援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侯利弗，是为处罗可汗。”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与《太平寰宇记》同

《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云：“二年始毕自将度河至夏州与贼梁师都合，又佐刘武周以五百骑入句注，将侵太原，会病死.....立其弟侯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作：“闰月朱粲遣使请降...突厥始毕可汗将其众度河至夏州，梁师都发兵会之，以五百骑授刘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会始毕卒.....立其弟侯利弗设为处罗可汗”

要解决始毕死亡的具体月份，必须要以闰月诸史所记之事为突破点，闰二月先是朱粲请降（武德二年闰二月初一），刘武周侵并州（闰二月初九），后是授徐世绩黎州总管（闰二月初十），朱粲杀段确（闰二月十四，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说时间不同）。

《旧唐书》卷一云：“闰月辛丑刘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旧将徐世绩以黎阳之众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风俗，即日还宫。甲寅，贼帅朱粲杀我使散骑常侍段确，奔洛阳。”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四云：“武德二年闰二月辛丑，可達寒贼朱粲遣使请降命，前御史大夫段确使于粲。”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云：“遣前御史大夫段确使于朱粲...丙辰以徐世绩为黎州总管。”

以上三条除时间略有出入外，都发生于闰二月，所以《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云：“二年二月...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以及《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唐会要》卷九十三所指二月实为闰二月。

《旧唐书》既有武德元年说，又有武德二年说，两者必有一误，若始毕可汗真死于武德元年，那么诸史中就没有必要出现武德二年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治所在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在介绍完始毕可汗渡河至夏州，梁师都与之会，始毕可汗卒时，补充说明上遣右武侯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治所在九原县，即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和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两地一南一北，正好相对毗邻。

根据以上几点可以断定，始毕可汗死于武德二年闰二月。

始毕可汗卒后，其弟侯利弗继位，是为处罗可汗。在处罗可汗在位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没有对李渊进行过真正的军事打击，这与其兄长始毕可汗咄吉以及其弟弟颉利可汗咄苾在对李渊的军事策略上截然不同，甚至在最有利的时机来临之时都不去进攻李渊，还自断右臂；这正如李世民与王世充交战正酣的时候窦建德妄图坐收渔利，但是他的行动实在是太晚了以至于李世民腾出手来对付他的时候王世充只能在城头兴叹。《旧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王世充，窦建德》传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师至新安，世充镇堡相次来降。.....八月，秦王陈兵于青城宫，世充悉兵来拒，.....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轳县，东徇地至管城而还，于是河南州县相次降附。十一月，窦建德又遣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且乞师。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诸门，与王师相抗，世充军败。因乘胜追之，屯其城门。世充步卒不得入，惊散南走，追斩数千级，虏五千余人。世充从此不复敢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长孙安世等于武牢，回至东都城下以示之，.....朱粲等十余人，皆戮于洛渚之上。”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集中全力攻打王世充，十一月，窦建德已同意救援王世充，但是到武德四年二月方出兵；之前窦建德三次攻打幽州罗艺，逼的罗艺降唐，反而对其构成包围之势，于是“窦建德帅众二十万复攻幽州.....攻之不克而还。”倘若窦建德能及早占领虎牢关，或者联络突厥共同夹击幽州罗艺，继而处罗可汗南下，天下形势则大不相同。窦建德的国子祭酒凌敬曾献策：“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渡蒲津（今陕西大荔东），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旧唐书·窦建

德列传》)。

而处罗可汗却是如此缺乏政治上的远见。以下是处罗可汗继位后对李渊发动的袭击,按时间顺序排列;引自《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夏,四月,刘武周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

八月,“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

九月二十一日,“丙戌,引曷娑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厥使者使杀之。”

武德三年:

六月,“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六月初二,“癸亥,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七月十三日,“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十三日),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黜废并州总管府,征仲文入朝。”

七月,“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之,斩首千余级。”

九月,“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

十一月,“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相连结,既而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得突厥衅隙,遣使以闻,为突厥候骑所获。处罗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请帅其民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处之。”

张举、刘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既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师都请为乡导。”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乍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入自幽州,会突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会于晋、绛。莫贺咄者,处罗之弟咄也;突利者,始毕之子什钵也。

处罗又欲取并州以居杨政道,其群臣多谏,处罗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将出师而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之,更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颉利遣使告处罗之丧,上礼之如始毕之丧。

处理可汗在位一年多时间内,进军黄蛇岭(岭在榆次县北),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的别称),武德三年十一月,采纳梁师都之言,本欲四路大军自原州(平凉郡置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延州、幽州(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滏口(滏水之口,今河北滏阳县)、会于晋(晋州,隋之临汾郡,今之山西临汾市南)、绛(绛州,隋之绛郡,治所在正平县,即今之山西新绛县)。但却临阵病故。

处罗可汗继位后在处理与诸势力的关系问题上仍旧与始毕保持一致,即以谋取短期利益为主,支持与打压结合,各方势力可以发展但均不可做大。但是却没有把握住限度。

隋朝义城公主在隋文帝时期嫁给启民可汗,后来嫁给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最后被李靖杀死,义城公主的一生都与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启民可汗时期,由于启民长期呆在隋境,且得到了隋的强力支持,故而义城公主在影响启民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非同一般。

《隋书》卷八四,列传第四九载:“是时安义公主已卒,上以

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

《北史》卷六四,列传第五二载:“及突厥启人可汗求和亲,复令誓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大业初,启人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于定襄、马邑间。”

待到始毕可汗继位,这种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还足以令可汗信从,始毕可汗多次进攻隋朝都仰仗义城公主通信,以至于后来隋炀帝被围困于雁门还求助于义城公主,义城公主言与始毕,始毕后来撤军。

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第一二载:“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壬申,车驾驰幸雁门。癸酉,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

旧唐书卷六三,列传第一三云:“炀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瑀进谋曰:‘如闻始毕托校猎至此,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贺敦知兵马事。昔汉高祖解平城之围,乃是阏氏之力。况义成以帝女为妻,必恃大国之援。若发一单使以告义成,假使无益,事亦无损。……义成公主遣使告急于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盖公主之助也。’”

而在处罗可汗时期起到的作用则微乎其微;惟一值得一提的是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接收宇文化及的首极。

而关于立政道为隋主的具体时间,诸史有所不同;且与迎萧皇后的时间混为一谈。

《隋书》卷五十九载:“有遗腹子政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载:“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口于窦建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十四载:“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冻之子政道口于窦建德,三年春处罗迎之至牙所,立政道为隋主。”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载:“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三年春处罗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为隋主。”

《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载:“取牛羊万余处罗迎隋萧皇后及齐王暕之子正道于窦建德所,因立正道为隋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载:“有遗腹子政道,建德立以为郕公,……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

三年春是笼统的讲法,可以指正月,二月,三月,因《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记为武德三年二月,《太平寰宇记》,《通典》皆记为武德三年春,所以有理由认为迎政道于突厥时间应为武德三年二月。王世充称帝时间为武德二年四月,待王世充称帝之后不久,窦建德才开始下诏,封隋炀帝为隋闵帝,封政道为郕公;武德二年闰二月,窦建德攻破聊城,生擒宇文化及,拜谒萧皇后,掌控隋遗腹子政道于其手;武德二年四月,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诸史将迎萧皇后和政道于突厥的时间并未一谈,其实分别是两个时间,两个人所迎,即武德二年四月义成公主派人先迎萧后于突厥,待到武德三年二月窦建德认为政道已完全没有价值之时,政道才被处罗可汗迎于牙帐。

对于一直坚持复隋的义成公主来说,迎立了一个对突厥毫无价值的萧皇后,也仅仅可以慰藉一下自己抑郁的心情;但仅靠这些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处罗时期也仅限于此了。

从窦建德在不同时段的表现来看,窦建德与突厥的关系便一目了然;迎立政道之事直接暴露出彼此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由此也反证出义成公主在处罗可汗时期地位的下降,甚至连处罗可汗的继位可能都与公主的支持无关,《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提到始毕可汗死,立处罗可汗,但是并未提及何人所立;只言:“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义成公主虽一心复隋,

(下转第172页)

在促进各项事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三、注重传承与利用的结合

品牌的价值在于品牌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品牌一定要满足社会行为的延伸。通过挖掘、整理、传承,丰富其活动内容,进一步增加其品牌价值,为社会提供财富。如做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化品牌,就要吸引更多大众参加到传统民间娱乐的活动中来,如大力发展独具的文化内涵的吴忠民俗民俗文化。吴忠民俗文化源远流长,长期以来,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和内涵丰富的民俗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如同心山区的口弦、花儿,盐池的信天游,青铜峡的劳动号子等,有回族舞蹈汤瓶舞、盖碗舞、羊响板舞,传统武术及体育项目何家棍、张家枪、杨氏回教拳、木球、穆民扇、方棋等,还有民间工艺剪纸、陶艺、麻编、刺绣、柳编、二毛皮制作工艺。民俗文化有传统节日文化、社火、庙会、婚俗等。此外,依托各旅游景点和历史遗迹,还有许多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如古峡传说、花马池传说、牛首山神话、回族民间故事等。这些文化遗产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挖掘、收集、抢救、保护和研究并加以开发和利用的。通过保护和传承,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获取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其活态的民情、民风、民俗,延伸历史文化的记忆,保护回族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并使文化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融入旅游产业之中。

四、注重创新和发展的结合

文化品牌应是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能够留在历史上的。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化样式。例如中国戏曲文化、建

筑文化、饮食文化等,都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长河中不朽的活的文物。在历史的延续中,它们也是在不断改进完善的。又如吴忠大力发展的回族商贸文化、饮食文化,就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定位。树立创新的品格,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为文化活动注入新意,注入活力,做到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步。

吴忠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西域的“商埠重镇”、“水旱码头”,唐古灵州时就是当时的交通要道,是“灵州道”“萧关道”“回鹘”和“灵州西域道”的交汇点。来往商旅络绎不绝,商品交易十分活跃。回族自治就有经商的特长,元代前就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到此经商。近代吴忠涌现出了一批有名的回族商人,最有名的有八大商号,如马月坡的福兴奎、李凤藻的天成和商号等,积淀了浓厚的回商文化。随着吴忠滨河水韵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市区框架的拉大,吴忠在周边县市的辐射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经济交往的拉动下,其特有的商贸、饮食文化潜能逐渐凸显出来,吴忠“沙漠王子”清真牛羊肉加工、“万娣妮”回族服饰出口创汇、吴忠饮食如民族饭庄、老毛手抓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品牌都为宁夏人民所熟悉。

因此,做品牌需要在内涵上发掘新创见,在形式上反映新创意,在机制上体现新创举。创新是品牌建设的核心竞争力,是品牌的强大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在策划和打造品牌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定位。树立创新的品格,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为文化活动注入新意,注入活力,做到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步。

(上接第170页)

但有心无力;甚至于武德三年十一月,处罗准备分四路进攻之时也只是采纳了梁师都的建议而史料中并未提及义成公主。因突厥可敦可知军事,故亦有发言权,在启民可汗时期,始毕可汗时期,颉利可汗时期义成公主均有发言权,且被采纳,而且多半是关于军事行动的,而唯独在处罗可汗时期没有这种记述,而唯一的记录还是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

从处罗可汗在位一年余来的作为来看,并没有对李渊和其它势力采取积极进攻。这不仅与他缺乏政治远见,还与义城公主影响力下降有关。待到处罗可汗死后,公主立颉利可汗,公主立说明公主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高潮。《新唐书》卷二一五上,《旧唐书》卷一九四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皆言始毕可汗为义成公主所立。从后来劝颉利可汗入侵唐朝,动辄出兵数十万,唐朝几乎以举国之力对抗突厥可以推知义成公主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云:“颉利复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云:“其弟善经亦依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颉利未得志,乃率十五万骑入雁门,围并州。”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云:“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

从唐朝执意杀掉公主而不杀颉利可汗可以看出义城公主对于颉利可汗的巨大影响力;这也正如同隋时的大义公主与都蓝可汗的关系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隋文帝必杀之而后快的原因;同是前朝公主,深怀亡国之恨。

处罗可汗在任时期既不积极进攻李渊,也不支持复隋。而是努力保持各势力间的平衡关系;前期帮助刘武周攻唐而后期又助唐除掉刘武周,其与刘武周的关系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利用,待到刘武周做大而不听控制之时便果断剪除。这点从刘武周败退后和苑君章的对话不难看出。《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云:“武周之南寇也,其内史令苑君璋谏曰:‘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县军深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武周不听,留君璋守朔州。及败,泣谓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于此。’”

综上所述,处罗可汗并不是复隋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大义公主一直是复隋的核心人物,她在始毕可汗,颉利可汗时期有着巨大政治影响力,但是在处罗可汗时期却无能为力,这与其政治影响力下降有直接关系,而其根源则是处罗的平衡外交。

参考文献:

-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M].
- [2][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一五上)[M].
-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M].
- [4][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M].
- [5][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三)[M].
- [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十四)[M].
- [7][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四)[M].
- [8]隋书(卷五十九)[M].
- [9][唐]李延寿.北史(卷六四)[M].
- [10]魏高.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5.